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係

全漢昇

一

現代世界各國的白銀，以西半球的美洲爲最主要的產地。(註一)在美洲的各重要銀礦中，于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見新大陸後，最先被大規模開採來利用的，爲中美洲的墨西哥 (Mexico)，和南美洲的祕魯 (Peru) 與玻璃維亞 (Bolivia) 的銀礦。尤其重要的，是西班牙人于一五四五年在上祕魯 (Upper Peru，今玻璃維亞) 的波多西(Potosí)發見非常豐富的銀礦，同時銀的採煉技術也大爲改進。結果，銀的生產激增，一五七二年世界銀產量約爲一四九六年的六倍。(註二) 由于這些銀礦的大量開發，今日全世界銀的供給，約有四分之三來自墨西哥和祕魯。(註三)

因爲哥倫布的發見新大陸是由西班牙政府派遣去的，故在那裏開採得來的白銀，每年都一船一船的大量運回西班牙。對于這個問題，現任美國支加哥大學經濟史教授哈密爾登 (Earl J. Hamilton) 曾于一九三四年發表他的大著一五〇一至一六五〇年美洲金銀與西班牙物價革命的關係(註四) 來加以研究。根據西班牙官方的統計數字，由一五〇三至一六六〇年自美洲運回西班牙的白銀共約一六、八八六、八一五、三〇

(註一) 例如在一九三三年全世界的銀產量中，墨西哥佔六九、一〇〇、〇〇〇盎斯，美國佔二一、四〇〇、〇〇〇盎斯，加拿大佔一五、四〇〇、〇〇〇盎斯，南美洲 (以秘魯及玻璃維亞爲主) 佔一三、五〇〇、〇〇〇盎斯，其他國家佔四三、六〇〇、〇〇〇盎斯。見 Herbert M. Bratter, "Silver," in Edwin R. A. Seligman, ed.,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1934.

(註二) G. N. Clark, The Wealth of England from 1496 to 1760, London, 1946, p. 58.

(註三) 小竹文夫自明至清中葉外國銀的輸入中國，支那研究 (上海) 第二十九號。

(註四) Earl J. 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501-1650, Cambridge, Mass., 1934.

三公分，黃金共約一八一、三三三、一八〇公分。(註一) 這不過是官方記載的數字，私人走私的數目還不包括在內。因爲當日流通的貨幣主要用銀來鑄造，故由于美洲白銀的大量輸入，西班牙的物價便激劇上漲，在十七世紀的頭十年內約爲一百年以前的三·四倍，此後西班牙的物價便長期停留在遠較過去爲高的水準之上。這些自美洲流入的白銀對于物價的影響，並不以西班牙爲限，因爲運銀的船隻，在橫渡大西洋的時候，有不少是給其他歐洲國家以海盜的方式掠奪去的。就是能够平安運抵西班牙的白銀，也不能全部長期停留在西班牙國境內。其中屬于國王所有的，要用來償還過去向德意志及意大利債主舉借的鉅額借款和利息，以及支付在國外（例如在荷蘭及比利時一帶）作戰的軍事費用。至于爲私人所有的銀子，因爲西班牙的物價水準遠較其他歐洲國家爲高，從而銀在西班牙的購買力遠較在他國爲小，故多半由于對外貿易的長期大量入超而流入其他國家。根據最保守的估計，由于美洲金銀（以銀爲主）的輸入，歐洲金、銀的數量自十六世紀初至十六世紀末約增加十倍。(註二)跟着這些白銀的大量流入，其他歐洲國家的物價自然也要激劇上漲。例如法國在十六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內的物價，約爲最初二十五年的二·二倍。荷蘭在一五八〇年的物價，約爲一五二〇年的三倍，以後在一六二〇年仍然繼續上漲。英國的食物價格，在一五〇〇至一五四〇年間上漲百分之六四，以後在十年內又再加倍，其一六〇〇年的一般物價約爲一五〇〇年的二·六倍。在十六世紀，阿爾薩斯 (Alsace) 的物價增加了一倍，意大利也將近加倍，瑞典到了一六二〇年則增加一倍有多。總之，就西歐及中歐各國來說，一六〇〇年的物價約爲一五〇〇年的兩倍至三倍。(註三)如果以一八〇〇年的物價爲基數，歐洲的物價指數在一五〇〇年爲三五，一六〇〇年爲七五，一七〇〇年爲九〇，一八〇〇年爲一〇〇。(註四)

哈密爾登教授關于美洲白銀與物價波動的關係之研究，以歐洲(尤其是西班牙)爲限。事實上，在哥倫布發見新大陸後的長期間內，美洲白銀對于物價的影響是具有世界

(註一) 同書，p. 42.

(註二) Edward Eyre., ed., European Civilization: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1937, p. 406.

(註三) Earl J. Hamilton, 前引書，pp. 139-306; 又參考 Herbert Heaton,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New York, pp. 247-251.

(註四) Frederick L. Nussbaum, A History of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Modern Europe, New York, 1937, pp. 98-99.

性的。換句話說，美洲白銀的大量輸出，不獨在大西洋對岸的歐洲要引起物價革命，就是在老遠的中國，其物價也要因感受到影響而發生激劇的變動。不過，因爲在地理位置上，中國和美洲的距離較遠，銀的直接自美洲經太平洋，或間接自美洲輾轉經歐洲大量運至中國，從而物價因受到影響而引起的波動，也不像歐洲各國那樣發生于十六七世紀，而遲至十八世紀始特別明顯的表現出來。現在爲行文方便計，先敍述十八世紀中國物價的變動情況，然後進而討論美洲白銀和當日中國物價變動的關係。

二

中國在十八世紀，包括了康熙(1662–1722)末葉，雍正 (1723–35)，乾隆 (1736–95)，及嘉慶 (1796–1820) 初葉，大體上相當于滿清的全盛時代。因爲貨幣與物價有密切的關係，在討論當日物價變動之前，我們先要明瞭清代貨幣制度的大概情況。清代貨幣制度的最主要特點是銀兩和制錢並用，兩者都具有無限法償的資格。可是，因爲兩者本身價值大小的不同，在市場上流通時，"銀與錢相爲表裏，以錢輔銀，亦以銀權錢，二者不容畸重。凡一切行使，大抵數少則用錢，數多則用銀。其用銀之處，官司所發，例以紋銀。至商民行使，自十成至九成八成七成不等，遇有交易，皆按照十成足紋遞相核算。蓋銀色之不同，其來已久。"(註一) 因爲當日流通的白銀，成色各有不同，故在使用時以十成紋銀或足銀爲標準，而由官方規定銀一兩等于制錢一千文。可是，事實上，這種銀、錢的法定比價，人民在市場上交易時，並不完全遵守；因爲除銀以外，主要以銅鑄造的制錢，其成色、重量以及流通量也因時而異，故銀、錢的市場比價也就跟着發生變化。現在根據各種記載，把清中葉以前的銀、錢市場比價列表如下：

第一表　清中葉以前銀、錢市場比價

年　　代	每兩銀換錢數(文)	根　據　材　料
康熙年間(1662–1722)	700	彭蘊章歸樸龕叢稿卷四錢幣策
康熙二十三年(1684)	800–900	宋澄之等皇朝掌故彙編內編一九
康熙六十年(1721)以前	880	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〇

(註一)　清朝文獻通考卷一六。

康熙六十年(1721)	780	同上
雍正七年(1729)	1,000	同上
約乾隆初年(1736)	700(+)-900	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卷五三郭起元廣鑄錢及陳廷敬杜制錢銷毀之弊疏
乾隆二年(1737)	800	皇朝掌故彙編內編一九
乾隆十八年(1753)	830-870	十朝聖訓卷一〇五乾隆十八年三月乙酉上諭
乾隆二十六年(1761)以前	780-790	汪輝祖病榻夢痕錄卷下
乾隆五十一年(1786)	1,000(-)	同上
乾隆五十七年(1792)	1,300	同上
乾隆五十九年(1794)	1,440-1,450	同上
乾隆六十年(1795)	900	蠶撲叢叢稿卷四錢幣策
嘉慶二年(1797)	1,020-1,030	汪輝祖夢痕錄餘
嘉慶四年(1799)	1,080	同上

由上表看來，我們可知中國在十八世紀末葉(乾隆末年至嘉慶初年)以前，銀、錢的市場比價多半在法定比價之下，即每兩銀在市場上換不到錢一千文，發生所謂“錢貴”的現象。反之，約自十八世紀末葉，或乾隆末年開始，每兩銀在市場上却換到一千文以上。清代的制錢主要以銅來鑄造，在乾隆大部分時間及乾隆以前，成色及重量都相當的高，如果銷燬制錢，把銅取出來製造銅器出售，可賺取鉅額的利潤。因此，政府的造幣廠儘管鑄錢，人民却普遍的秘密把錢銷燬，以致錢的流通量減小，造成“錢貴”的現象。(註一)隨着錢的價值的增貴，人民發見私鑄成色及重量較低的錢，可獲厚利，故到了乾隆“季年，私鑄益多，四川、雲、貴爲淵藪，流布及江、浙。”(註二)乾隆末葉私錢流通增加的結果，錢的價值自然激劇下跌，故在當日白銀供給增加(註三)的情形下，每兩銀在市場上仍然可換錢一千文以上。

明瞭了清中葉以前銀、錢的市場比價以後，我們對于當日某些以錢表示的物價便可按照上表來把牠換算爲以銀表示的物價，以便互相比較來觀察牠的變動情況。

三

中國的物價水準，到了十八世紀，尤其是乾隆時代(1736-95)，和從前比較起來，

(註一) 十朝聖訓卷一〇四乾隆十年正月辛巳上諭；史料旬刊（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出版）第十四期范時綬摺（乾隆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又參考張德昌近代中國的貨幣，人文科學學報（昆明，民國三十一年）第一卷第一期。

(註二) 清史稿食貨志五。又汪輝祖病榻夢痕錄卷下也說浙江嘉山一帶，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私錢充斥，法禁不能止。”在嘉慶元年（1796），“民間小錢愈熾。”

(註三) 詳見下。

有長期上升的趨勢。關于這種物價長期變動的趨勢，當日人們已經深深感覺到。例如乾隆十三年(1748)，湖南巡撫楊錫紱上陳明米貴之由疏(註一)說，"臣生長鄉村，世勤耕作，見康熙年間(1662–1722)稻穀登場之時，每石不過二三錢。雍正年間(1723–35)則需四五錢，無復二三錢之價。今則必需五六錢，無復三四錢之價。"又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月，乾隆帝的上諭說，"米糧價值……日增，……且不必以遠論，自乾隆三年(1738)至今，亦已三十餘年，當時之所謂貴價，卽係邇來之所謂賤價。黃童白叟，當亦無不共知。……況天下無不食米之人，米價既長，凡物價、夫工之類，莫不準此遞加。"(註二)又乾隆五十八年(1793)，洪亮吉說，"聞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時，米之以升計者錢不過六七，布之以丈計者錢不過三四十。……今則不然。……昔之以升計者，錢又須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計者，錢又須一二百矣。"(註三)由此可見，自十七世紀後半至十八世紀，卽自康熙經雍正以至乾隆年間，中國的米糧及其他物品的價格，有越來越上漲的趨勢。

關于十八世紀中國物價上漲的趨勢，我們可先拿米價來作一說明。自唐、宋時代以來，中國最重要的米產地爲長江三角洲，過去有"蘇、常(一作湖)熟，天下足"之稱。位于長江三角洲的蘇州，是清中葉以前重要米市的所在地。在那裏集中的米，除產于長江三角洲外，又有不少自湖廣（湖南、湖北）及江西沿長江東下運來的。這些米集中在蘇州以後，除由當地人口消費外，有一部分由政府往北沿運河運往首都北京，另外一部分則由商人運銷于浙江南部及福建等地。(註四)因爲蘇州是全國米糧的重要集

(註一) 載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卷三九。按楊錫紱，江西清江人，文中說他生長的故鄉，當卽指此而言。參考清史稿列傳九五楊錫紱傳。

(註二) 乾隆東華續錄卷七六乾隆三十七年十月癸未條。

(註三) 洪亮吉卷施閣文甲集卷一生計篇。按洪氏此文撰于乾隆五十八年，見呂培等編洪北江先生年譜。

(註四) 例如乾隆東華續錄卷二七載乾隆十三年五月乙酉上諭說，"浙南一帶地方所產之米，不足供本地食米之半，全藉江西、湖廣客販米船，由蘇州一路接濟。"又皇朝經世文編卷四四載蔡世遠與浙江黃撫軍請開米禁書云，"福建之米，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雖豐年多取資于江、浙。亦猶江、浙之米，原不足以供江、浙之食，雖豐年必仰給于湖廣。數十年來，大都湖廣之米轉集于蘇郡之楓橋，而楓橋之米，間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故歲雖頻稔，而米價不騰。"又同書卷四七載江寧布政使晏斯盛上制府論布商易米書說，"查江(西)、(湖)廣米船，開江東下，其口岸有三：棕陽、蕪湖、蘇州是也。"又文獻叢編第三〇輯載李煦奏報蘇州米價騰貴摺（康熙四十五年三月）說，"蘇州地方……米價忽然騰貴，……臣煦留心打聽，蓋因各行家有攬福建人買米，每石價銀一兩八錢，包送至乍浦出海，以致本地米價頓貴。"又同書第三一輯載李煦奏報太倉夥賊供有一念和尙給惑衆摺（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說，"至于蘇、松米價騰貴，……因湖廣客米到少，……"

散地，在那裏米市成交的價格，對全國許多地方的米價，當然具有影響的力量，故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米價漲落的趨勢來觀察當日全國米價變動的大概情形。關于十八世紀的蘇州米價，很幸運的，我們根據藏于北平清故宮懋勤殿的李煦奏摺，可以找到不少有價值的資料。李煦在康熙朝的後半，卽十七八世紀之交的三十年內，任蘇州織造員外郎，因爲他是皇帝的親信，故每年都經常直接上奏摺給皇帝，報告江南地方政治、社會及經濟各方面的動態。這些奏摺約共數百件，在抗戰以前由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加以整理，以蘇州織造李煦奏摺作總標題，先後分別刋印于該館編輯的文獻叢編各輯中。奏摺的時間始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終于康熙末年(1722)，其中有不少部分爲報告蘇州一帶(有時連揚州也包括在內)米價的文件。以這些材料爲基礎，再加上其他有關此時期以前及以後的蘇州米價的記載，我們可以把自康熙四年(1665)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蘇州米價列表如下：

第二表　清中葉以前蘇州每石米價(兩)

年代	上米價格	次米價格	根據材料
康熙四年(1665)	0.80-0.90	0.60-0.70	曹允源等修吳縣志（民國廿二年）卷四四載康熙四年韓世琦疏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	0.90-1.00	0.70	文獻叢編第二九輯李煦奏報蘇州已得甘霖其價亦平摺（康熙三十二年七月）
同年十月	1.00		同上李煦奏報秋收米價摺（康熙三十二年十月）
康熙三十七年(1698)十一月	1.00(+)	0.80-0.90	同上李煦請安並報秋收米價摺（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
康熙四十五年(1706)三月	1.35-1.43		同書第三〇輯李煦奏報蘇州米價騰貴摺（康熙四十五年三月）
康熙四十六年(1707)八月	1.20-1.47		同上李煦奏報蘇州得雨人心業已安寧摺（康熙四十六年八月）
同年十月	1.10-1.20		同書第三二輯李煦奏報蘇屬民田收成分數摺（康熙四十六年十月）
同年(1708)十二月	1.60-1.70		同書第三一輯李煦奏報太倉豫賊供有一念和尙給劉惑衆摺（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
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	1.30-1.40		同書第九輯江寧織造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寅奏報米價及熊賜履行動並進詩稿摺（康熙四十八年三月）
康熙五十一年(1712)八至十二月	0.80	0.70	同書第三四輯李煦奏報米價摺（康熙五十一年八月初八日），奏報米價摺（同年十月

			初四日)，及奏天氣晴和並報米價摺（同年十二月十一日）
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	0.80	0.70	同書第三五輯李煦奏冬雪已降並報米價摺（康熙五十二年正月十三日）
同年閏五月	1.00	0.90	同上李煦奏報督催各竈戶趕緊煎鹽以供捆運並報米絲價目摺（同年閏五月二十三日）
同年六月	1.10	1.00	同上李煦奏報督催煎鹽並報米價摺（同年六月初九日）
同年七月	1.00	0.90	同上李煦奏引鹽陸續出場將次運到儀眞並報米麥價目摺（同年七月初五日）
同年八月	1.00-1.06	0.90-0.96	同上李煦奏報已赴儀眞秤掣商鹽並報米麥價目摺(同年八月初六日)，及奏報早稻已割晚稻現正刈穫並報米麥價目摺（同年同月二十一日）
同年十至十二月	1.00	0.90	同上李煦奏報米麥價目摺（同年十月初六日)，奏報冬雪已降及米麥價目摺（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及奏報米價摺（同年十二月初九日）
康熙五十三年(1714)正月至四月	1.00	0.90	同書第三六輯李煦奏報米價摺（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奏春雨時降並報米價摺（同年三月十一日)，及奏四省重運糧船過揚北上並報米價摺（同年四月十一日）
同年六月	1.10	1.00	同上李煦奏雨澤缺少並報米絲價目摺（同年六月初九日）
同年七月	1.14-1.15	1.05-1.06	同上李煦奏甘霖連降今秋仍望豐收並報米價摺（同年七月十三日）
同年八月	1.04-1.06	0.90(+)	同上李煦奏產鹽地望雨心切並報米價摺（同年八月二十一日）
同年九月	1.10	1.00	同上李煦奏刈稻將完並報米價摺（同年九月二十日）
同年十月	1.04-1.05	0.92-0.93	同上李煦奏報米價摺（同年十月初六日）
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	1.10	1.00	文獻叢編二十六年第一輯李煦奏報雨水調勻及米價摺（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同年五月	1.16-1.18	1.05-1.07	同上李煦奏報米價並御種稻子已浸秧插蒔摺（同年五月十六日）
同年六月	1.15-1.17	1.06-1.08	同上李煦奏插秧分數並報米絲價目摺（同年六月初六日）
同年七至九月	1.20	1.10	同上李煦奏雨水米價並報張鵬翮審撫臣已完摺(同年七月初七日)，奏春夏雨多並報米價摺(同年八月二十日)，及奏報米價並今秋輪值解送龍衣進京摺(同年九月初十日)

康熙五十五年(1716)二月	1.00	0.90	同書二十六年第二輯李煦奏報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康熙五十五年二月十八日）
同年三月至六月上半	1.10	1.00	同上李煦奏報天時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三月初四日），奏報御種稻子插秧情形及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閏三月十二日)，奏報麥子收成情形及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四月初九日），奏報米價絲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五月十二日)，及奏報天時米價並進晴雨錄表（同年六月十五日）
同年六月下半至七月	1.10	0.90	同上李煦奏報御種稻子收割情形及米價摺（同年六月二十五日），及奏報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七月初四日）
同年八月	1.10	1.00	同上李煦奏報天時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八月初三日）
同年九月	1.10	0.95	同上李煦奏報米價及御種稻子現已收割並進晴雨錄摺（同年九月十六日）
同年十月	1.15	1.00	同上李煦奏報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十月初二日）
同年(1717)十二月	1.14-1.15	1.04-1.05	同上李煦奏報江都儀眞二縣設立粥廠情形及蘇揚二州天時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十二月初八日）
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	1.10	1.00	同書二十六年第三輯李煦奏報米價摺（康熙五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同年三月	1.16-1.17	1.07-1.08	同上李煦奏御種稻子已分發並報米價雨水摺（同年三月十一日）
同年四月	1.15-1.16	1.04-1.05	同上李煦奏報雨水米價摺(同年四月初十日)
同年五至六月	1.10	1.00	同上李煦奏報雨水米價摺（同年五月初六日），及奏報雨水米價絲價摺（同年六月初三日）
同年八月	1.10	0.95	同書二十六年第四輯李煦奏報雨水米價摺（同年八月初九日）
同年九月	1.00	0.90	同上李煦代僧廣明進呈奏摺並報雨水米價摺（同年九月初九日）
同年十月	0.90	0.80	同上李煦奏報御稻已收訖摺（同年十月十一日）
同年十一至十二月	0.95	0.80	同上李煦進晴雨錄摺(同年十一月初七日)，及進呈晴雨錄摺（同年十二月初七日）
康熙五十七年(1718)四月	1.00	0.90	同書二十六年第五輯李煦奏報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康熙五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同年五月	1.05	0.95	同上李煦奏報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五月十七日）
同年六至八月	1.00	0.90	同上李煦奏報米價絲價並進晴雨錄摺（同

			年六月十六日），奏報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七月初五日），及同書二十六年第六輯李煦奏報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八月初八日）
同年閏八月	0.90-0.95	0.70-0.85	同上李煦奏報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閏八月初九日）兩件，及奏報雨水米價摺（同年閏八月二十二日）
同年十至十一月	0.85	0.65	同上李煦奏報雨水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十月初五日），及奏報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十一月十六日）
康熙五十八年(1719)四至六月	0.95	0.75	同書二十六年第七輯李煦奏報雨水米價並所種御稻情形摺（康熙五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奏報雨水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五月初六日），及同上摺(同年六月初十日)
同年六至九月	0.87	0.73	同上李煦奏報絲價米價摺（同年六月二十四日），奏報雨水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七月初八日），同上摺(同年八月初七日)，及奏報收割早稻及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九月初十日）
同年十至十二月	0.80	0.70	同上李煦奏報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十月初八日），同上摺(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及同上摺（同年十二月初十日）
乾隆十三年(1748)	(註一) 2.00		吳縣志卷七九引吳門補乘
乾隆三十五年(1770)	(註二) 4.46		同書卷五二上引采訪冊
乾隆五十一年(1786)	(註三) 4.30(＋)		病榻夢痕錄卷上

爲着便于觀察當日蘇州米價的變動，我們可以根據第二表，把蘇州上米的每年平均價格及指數計算出來，作成第三表。

第三表　清中葉以前蘇州上米價格指數(基期：康熙五十二年，即1713年)

年代	每石上米價格(兩)	指數	年代	每石上米價格(兩)	指數
康熙四年(1665)	0.85	86	康熙三十二年(1693)	0.98	99

(註一) 原文說米每升賣錢十七文，即每石一千七百文。據第一表，當日每兩銀約換錢八百三十至八百七十文。由此計算，乾隆十三年蘇州米價，如以銀表示，爲每石二兩。

(註二) 原文說米每斗值三百五十文，即每石三千五百文。據第一表，當日銀一兩約換錢七百八十至七百九十文。由此計算，可知當日以銀表示的米價爲每石四兩四錢六分左右。

(註三) 原文說，"無錫……市米價，一石四千三百錢。" 無錫和蘇州距離不遠，米價當甚接近，故拿這一數目來代表當日蘇州米價。又據第一表，當日銀一兩換錢一千文少點。由此計算，知當日以銀表示的米價爲每石四兩三錢以上。

康熙三十七年(1698)	1.00	101	康熙五十四年(1715)	1.17	118
康熙四十五年(1706)	1.39	140	康熙五十五年(1716)	1.10	111
康熙四十六年(1707)	1.25	126	康熙五十六年(1717)	1.05	106
康熙四十七年(1708)	1.65	167	康熙五十七年(1718)	0.96	97
康熙四十八年(1709)	1.35	136	康熙五十八年(1719)	0.86	87
康熙五十一年(1712)	0.80	81	乾隆十三年(1748)	2.00	202
康熙五十二年(1713)	0.99	100	乾隆三十五年(1770)	4.46	451
康熙五十三年(1714)	1.05	106	乾隆五十一年(1786)	4.30(+)	434

資料來源：見第二表。

由第三表觀察，我們可知在十七八世紀之交的數十年內，蘇州米價雖然也有漲落，但漲落的幅度不大，大體上還算平穩；可是到了十八世紀後半，米價水準却遠較十七八世紀間爲高，而且長期停留在較高水準之上。爲着便于表示這種物價長期變動的趨勢，我們還可以根據第三表繪成清中葉以前蘇州上米價格指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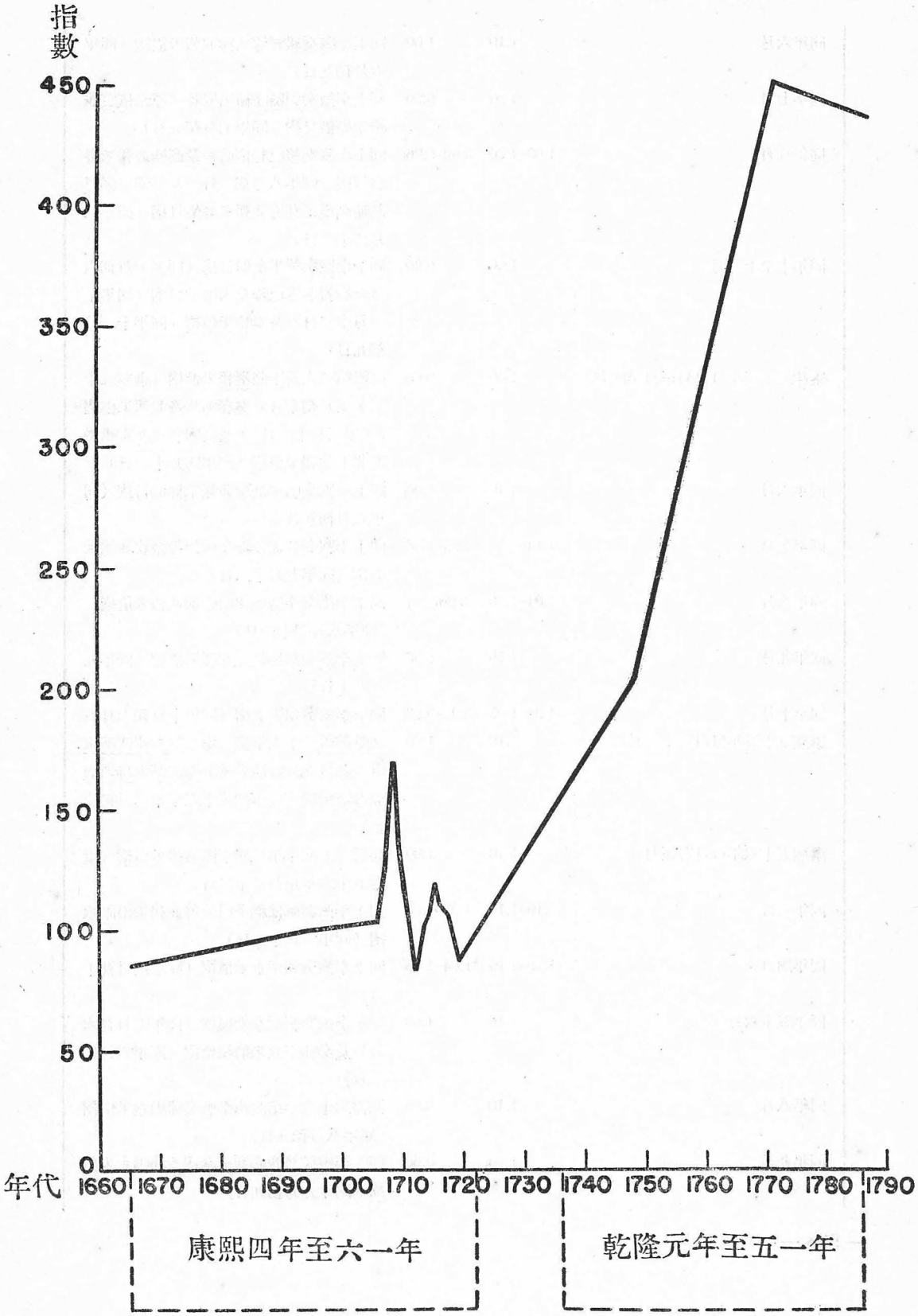
除蘇州以外，位于長江和運河交叉點的揚州，交通便利，商業發達，在那裏成交的米價也對國內其他地方的米價具有影響的力量。這裏的米價也和蘇州一樣，在十八世紀下半要比過去高漲得多。關于揚州的米價，除如上述利用文獻叢編各輯刊印出的蘇州織造員外郎李煦的奏摺以外，我們又可利用江寧織造郎中曹寅的奏摺及其他記載來作成第四和第五兩表，及清中葉以前揚州上米價格指數圖。

第四表　清中葉以前揚州每石米價(兩)

年　　代	上米價格	次米價格	根　據　材　料
康熙三十六年(1697)十月	0.80(+)	0.70(+)	文獻叢編第十輯江寧織造郎中曹寅奏捐運賑米到淮情形摺（康熙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康熙四十八年(1709)二月	1.20-1.30		同上江寧織造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寅奏懇嬪移居並報米價摺（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初八日）
康熙五十一年(1712)八至十二月	0.80	0.70	同書第三四輯李煦奏報米價摺（康熙五十一年八月初八日），同上摺（同年十月初四日），及奏天氣晴和並報米價摺（同年十二月十一日）
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	0.80	0.70	同書第三五輯李煦奏多雪已降並報米價摺（康熙五十二年正月十三日）
同年閏五月	1.00	0.90	同上李煦奏報督催各籠戶趕緊煎鹽以供捆運並報米絲價目摺（同年閏五月二十三日）

第一圖　清中葉以前蘇州上米價格指數

（基期～1713年）



同年六月	1.10	1.00	同上李煦奏報督催煎鹽並報米價摺（同年六月初九日）
同年七月	1.00	0.90	同上李煦奏引鹽陸續出場將次運到儀眞並報米麥價目摺（同年七月初五日）
同年八月	1.00-1.06	0.90-0.96	同上李煦奏報已赴儀眞秤掣商鹽並報米麥價目摺（同年八月初六日），及奏報早稻已割晚稻現正刈穫並報米麥價目摺（同年八月二十一日）
同年十至十二月	1.00	0.90	同上李煦奏報米麥價目摺（同年十月初六日），奏報冬雪已降及米麥價目摺（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及奏報米價摺（同年十二月初九日）
康熙五十三年(1714)正月至四月	1.00	0.90	同書第三六輯李煦奏報米價摺（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奏春雨時降並報米價摺（同年三月十一日），及奏四省重運糧船過淮北上並報米價摺（同年四月十一日）
同年六月	1.10	1.00	同上李煦奏雨澤缺少並報米絲價目摺（同年六月初九日）
同年七月	1.14-1.15	1.05-1.06	同上李煦奏甘霖連降今秋仍望豐收並報米價摺（同年七月十三日）
同年八月	1.04-1.06	0.90(+)	同上李煦奏淮鹽地窄雨心切並報米價摺（同年八月二十一日）
同年九月	1.10	1.00	同上李煦奏刈稻將完並報米價摺（同年九月二十日）
同年十月	1.04-1.05	0.92-0.93	同上李煦奏報米價摺（同年十月初六日）
康熙五十五年(1717)十二月	1.10	1.00	文獻叢編二十六年第二輯李煦奏報江都儀眞二縣設立施廠情形及蘇揚二州天時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
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	1.10	1.00	同書二十六年第三輯李煦奏報米價摺（康熙五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同年三月	1.16-1.17	1.07-1.08	同上李煦奏御種稻子已分發並報米價雨水摺（同年三月十一日）
同年四月	1.15-1.16	1.04-1.05	同上李煦奏報雨水米價摺（同年四月初十日）
同年五至六月	1.10	1.00	同上李煦奏報雨水米價摺（同年五月初六日），及奏報雨水米價絲價摺（同年六月初三日）
同年八月	1.10	0.95	同書二十六年第四輯李煦奏報雨水米價摺（同年八月初九日）
同年九月	1.00	0.90	同上李煦代僧廣明進呈奏摺並報雨水米價摺（同年九月初九日）

同年十月	0.90	0.80	同上李煦奏報御稻已收訖摺（同年十月十一日）
同年十一至十二月	0.95	0.80	同上李煦進晴雨錄摺(同年十一月初七日)，及進呈晴雨錄摺（同年十二月初七日）
康熙五十七年(1718)五月	1.05	0.95	同書二十六年第五輯李煦奏報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康熙五十七年五月十七日）
同年六至八月	1.00	0.90	同上李煦奏報米價絲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六月十六日），奏報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七月初五日)，及同書二十六年第六輯奏報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八月初八日）
同年閏八月	0.90	0.70-0.75	同上李煦奏報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閏八月初九日），及奏報雨水米價摺（同年閏八月二十二日）
同年十至十一月	0.85	0.65	同上李煦奏報雨水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十月初五日），及奏報米價並進晴雨錄摺（同年十一月十六日）
乾隆五十一年(1786)	4.80(+)(註一)		病榻夢痕錄卷上

第五表　清中葉以前揚州上米價格指數(基期：康熙五十二年，即1713年)

年　代	每石上米價格(兩)	指　數	年　代	每石上米價格(兩)	指　數
康熙三十六年(1697)	0.80(+)	81	康熙五十五年(1716)	1.10	111
康熙四十八年(1709)	1.25	126	康熙五十六年(1717)	1.05	106
康熙五十一年(1712)	0.80	81	康熙五十七年(1718)	0.95	96
康熙五十二年(1713)	0.99	100	乾隆五十一年(1786)	4.80(+)	485
康熙五十三年(1714)	1.05	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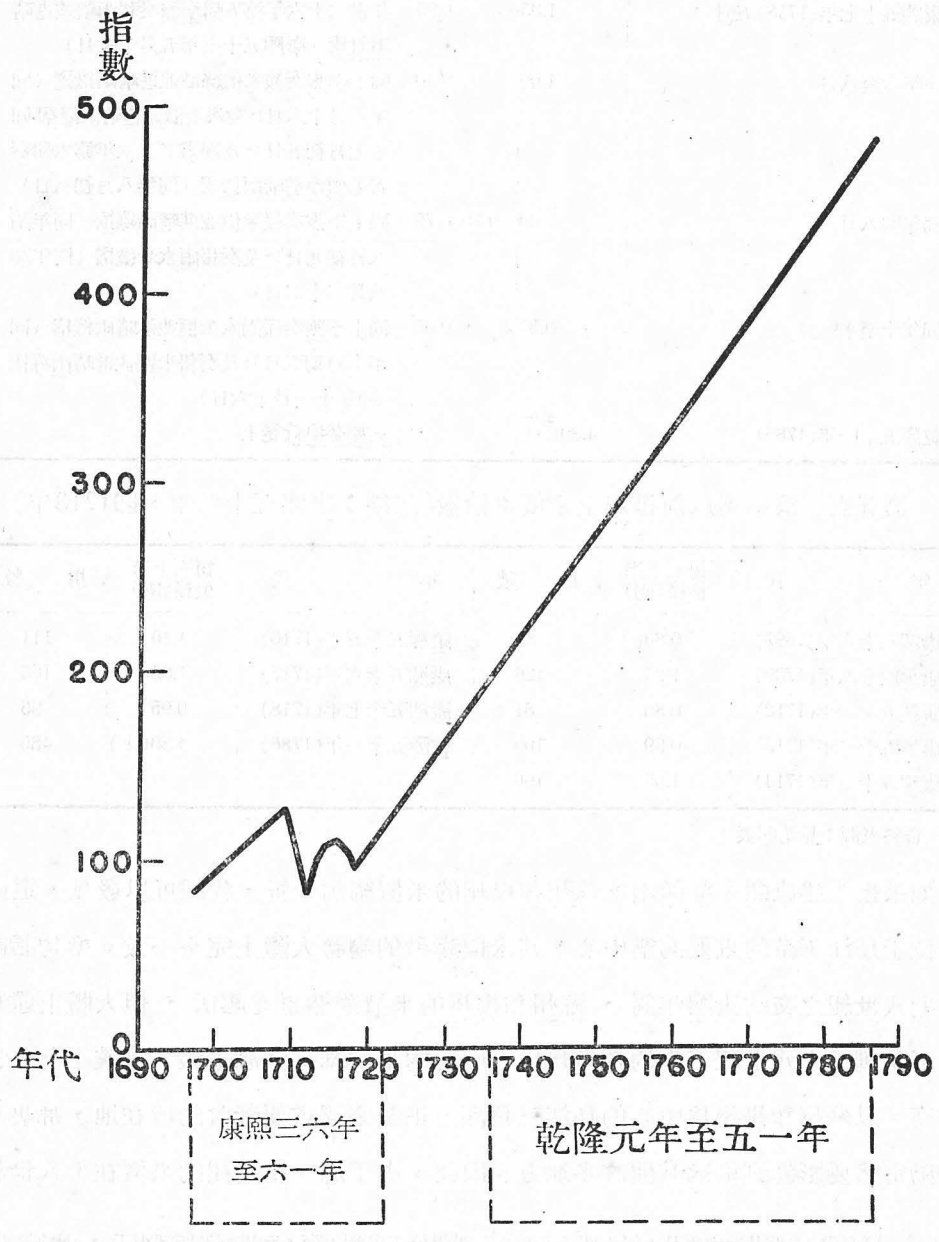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見第四表。

如果把上述康熙和乾隆兩朝蘇州和揚州的米價細加分析，我們可以發見，這兩個同樣位于長江下游的重要商業中心，其米價變動的趨勢大體上完全一致。換句話說，在十七八世紀之交的康熙年間，蘇州和揚州的米價雖然也有起伏，但大體上還算平穩；可是到了十八世紀下半的乾隆時代，兩地的米價却都激劇上漲，遠較十七八世紀間爲高。以蘇州和揚州爲中心的長江三角洲，正是全國重要穀倉的所在地，那裏米價的變動當然要影響到全國其他許多地方。因此，由于蘇、揚兩州的米價在十八世紀一

（註一）原文說，"丹陽米價更昂，每石四千八百。"丹陽位于揚州以南，和揚州的距離很近，兩地的米價當然不會相差太遠，故我們可以拿乾隆五十一年丹陽的米價來代表當日揚州的米價。又據第一表，當日的銀、錢市場比價爲每兩銀換錢一千文少點。依照這個比價來把每石四千八百文的米價換算爲以銀表示，我們可知當日米價約爲每石四兩八錢以上。

第二圖　清中葉以前揚州上米價格指數

（基期～1713年）



致上漲的趨勢，我們可以推知當日國內其他許多地方的米價也一定會發生相似的波動，雖然由于各地的特殊情況，波動的程度並不完全一樣。關于此點，我們可以舉出浙江

和江西米價的變動來作證明。

現在讓我們先看看浙江的米價。說到浙江米價的變動，我們可以舉出蕭山（屬紹興府）的米價來做代表。在蕭山生長的汪輝祖，于乾隆、嘉慶間撰有病榻夢痕錄上下兩卷，及夢痕錄餘一卷，書中常常提及他的故鄉的米價，故我們可以根據他的著作，再加上其他有關的記載，來研究十八世紀蕭山米價變動的情況。現在我們先把這些資料，依照原文所用以表示米價的貨幣單位，列表如下。

第六表　清中葉以前蕭山每石米價

年　　代	價　　格	根　據　材　料
康熙三十五年(1696)	銀0.50兩	彭延慶等修蕭山縣志稿（民國廿四年）卷五引乾隆舊志
康熙五十二年(1713)	銀1.30-1.40兩	文獻叢編第三五輯李煦奏報浙江衢州府等處旱災摺（康熙五十二年九月初二日）
約乾隆六年(1741)至十二年(1747)	錢900-1,000文	病榻夢痕錄卷下（汪輝祖十餘歲時）
乾隆十三年(1748)	錢1,600文	同上
乾隆二十一年(1756)	錢3,000文	同書卷上
乾隆五十七年(1792)	錢2,800-3,100(+)文	同書卷下
乾隆五十九年(1794)	錢3,300-3,400文	同上
嘉慶元年(1796)	錢3,300-3,400文	夢痕錄餘

爲着便于比較，我們現在根據第一表，把第六表中以錢表示的米價改算爲以銀表示，並計算出米價指數，作成第七表，及繪成清中葉以前蕭山米價指數圖。

第七表　清中葉以前蕭山米價指數(基期：康熙五十二年，即17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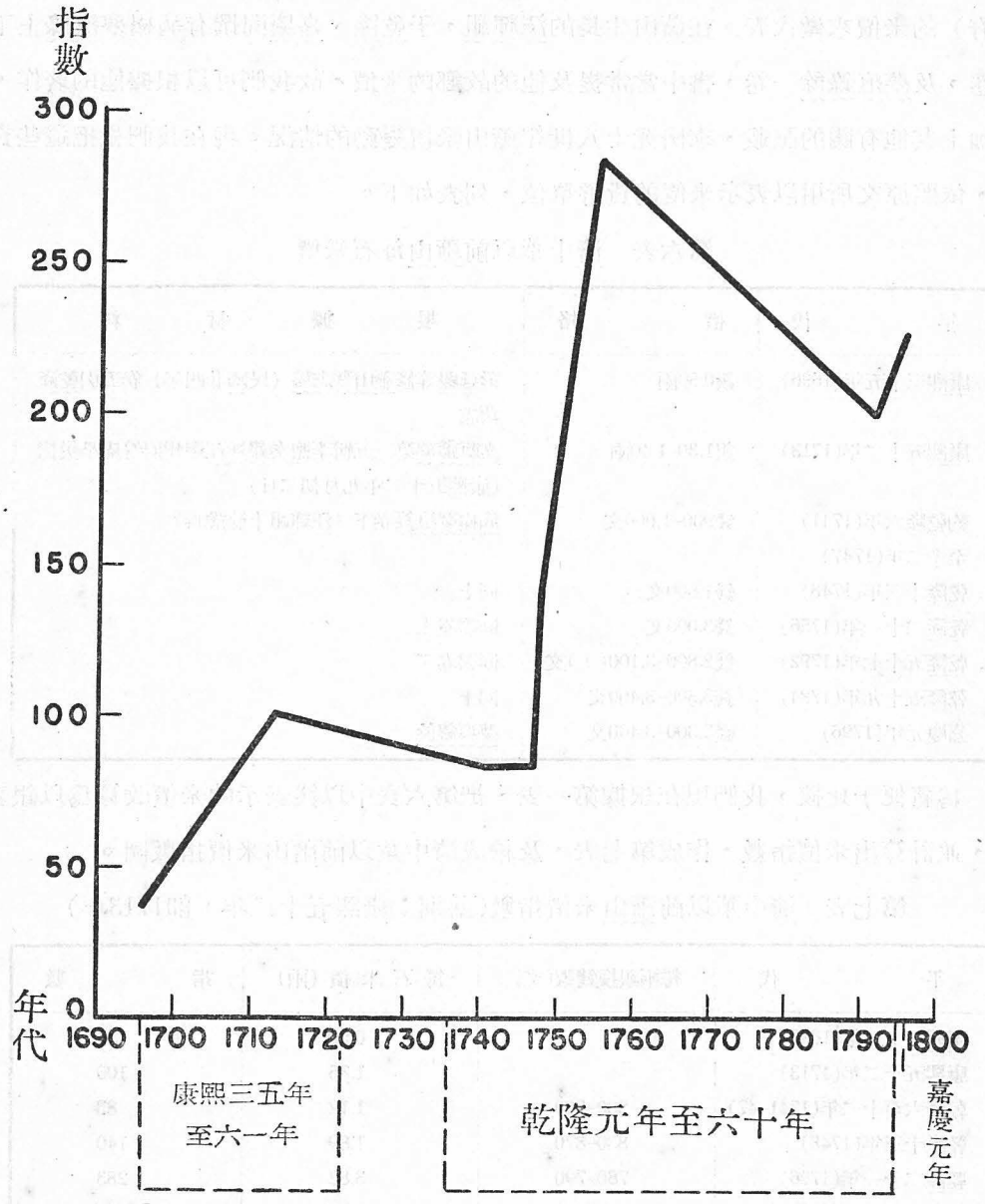
年　　代	每兩銀換錢數(文)	每石米價(兩)	指　　數
康熙三十五年(1696)		0.50	37
康熙五十二年(1713)		1.35	100
乾隆六至十二年(1741-47)	800-900	1.12	83
乾隆十三年(1748)	830-870	1.89	140
乾隆二十一年(1756)	780-790	3.82	283
乾隆五十七年(1792)	900-1,300	2.68	199
乾隆五十九年(1794)	900-1,450	2.85	211
嘉慶元年(1796)	900-1,300	3.05	226

資料來源：見第六表。

復次，讓我們看看江西的米價。在康熙五十年(1711)五月，江西“省城米價每石

第三圖　清中葉以前蕭山米價指數

（基期～1713年）



賣銀八錢至八錢三四分不等，各府亦相去不遠。”(註一)可是，到了乾隆十六年(1751)，“江西之廣信府米價貴至四兩以外。”(註二)

(註一)　文獻叢編第一二輯江西巡撫郎廷極奏報護送西洋人傅聖澤進京摺（康熙五十年五月十六日）。

(註二)　史料旬刊第十五期浙江巡撫永貴奏覆杭城旗民鬪毆情形摺（乾隆十六年）。

由此可見，無論是在浙江，或是在江西，到了十八世紀下半的乾隆時代，米價也和蘇、揚兩州那樣要比十七八世紀間的康熙時代高漲得多，雖然高漲的程度並不絕對相同。根據這些觀察，我們可以判斷，當日以蘇州和揚州爲中心的長江三角洲的米價上漲趨勢是具有全國性的，在整個十八世紀大約上漲四倍以上。

我們在上文討論十八世紀中國物價上漲的趨勢，偏重于米價方面。事實上，除米價以外，當日其他各種物品的價格也一樣的向上升漲，不過上漲的程度各有不同而已。茲就其他物品的價格分述如下：

（1）絲價　在乾隆時代，除由國內消費以外，絲是對外貿易的重要輸出品，其輸出價值只次于茶。當日"外洋各國夷船到粵，販運出口貨物，均以絲貨爲重，每年販買湖絲並紬緞等貨自二十萬餘斤至三十二三萬斤不等。統計所買絲貨，一歲之中，價值七八十萬兩，或百餘萬兩。至少之年，亦買價至三十餘萬兩之多。其貨均係江、浙等省商民販運來粵，賣與各行商，轉售外夷，載運回國。"(註一) 到了乾隆二十四年 (1759) 前後，絲價特別昂貴，有些人歸咎于出口過多所致，(註二) 故政府下令禁絲出口。(註三) 可是，"自禁止出洋以來並未見絲斤價平，" 同時英國商人又要求准許出口，故政府于乾隆二十七年 (1762) 規定，"每船准其配買土絲五千斤，二蚕湖絲三千斤。"(註四) 到了乾隆二十九年(1764)，因爲前任浙江巡撫莊有恭 "體察杭、嘉、湖三府民情，以絲斤弛禁爲便，"政府對絲的出口遂完全弛禁。(註五) 茲將清中葉以前廣州絲價指數列表及繪圖如下。

第八表　清中葉以前廣州絲價指數(基期：康熙四十三年，即1704年)

年　　代	每擔絲價 (兩)	見于 H. B. Morse 書的卷數及頁數	指　　數
康熙三十八年(1699)	127-137	vol. I, p. 90	132

(註一)　同上李侍堯奏請將本年洋商已買絲貨准其出口摺 (乾隆二十四年)。

(註二)　例如同書第一八期李兆鵬摺(乾隆二十四年)云，"臣見近年以來，南北絲貨騰貴，價值較往歲增至數倍。……查絲之出產，各省俱有，而以江、浙爲最多。顧因地近海洋，……民間商販，希圖重利出賣，洋艘轉運，多至盈千累萬，以致絲價日昂。"

(註三)　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三九載乾隆二十七年上諭云，"前因出洋絲斤過多，內地市價翔踴，是以申明限制，俾裕官民織紝。"(乾隆東華續錄卷五五略同) 又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vol. V (1929), pp. 87, 100 也說中國于 1760 及 1761 (乾隆二十五及二十六年) 禁絲出口。

(註四)　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三九，乾隆東華續錄卷五五，王之春國朝柔遠記卷五。

(註五)　乾隆東華續錄卷五九乾隆二十九年三月辛未上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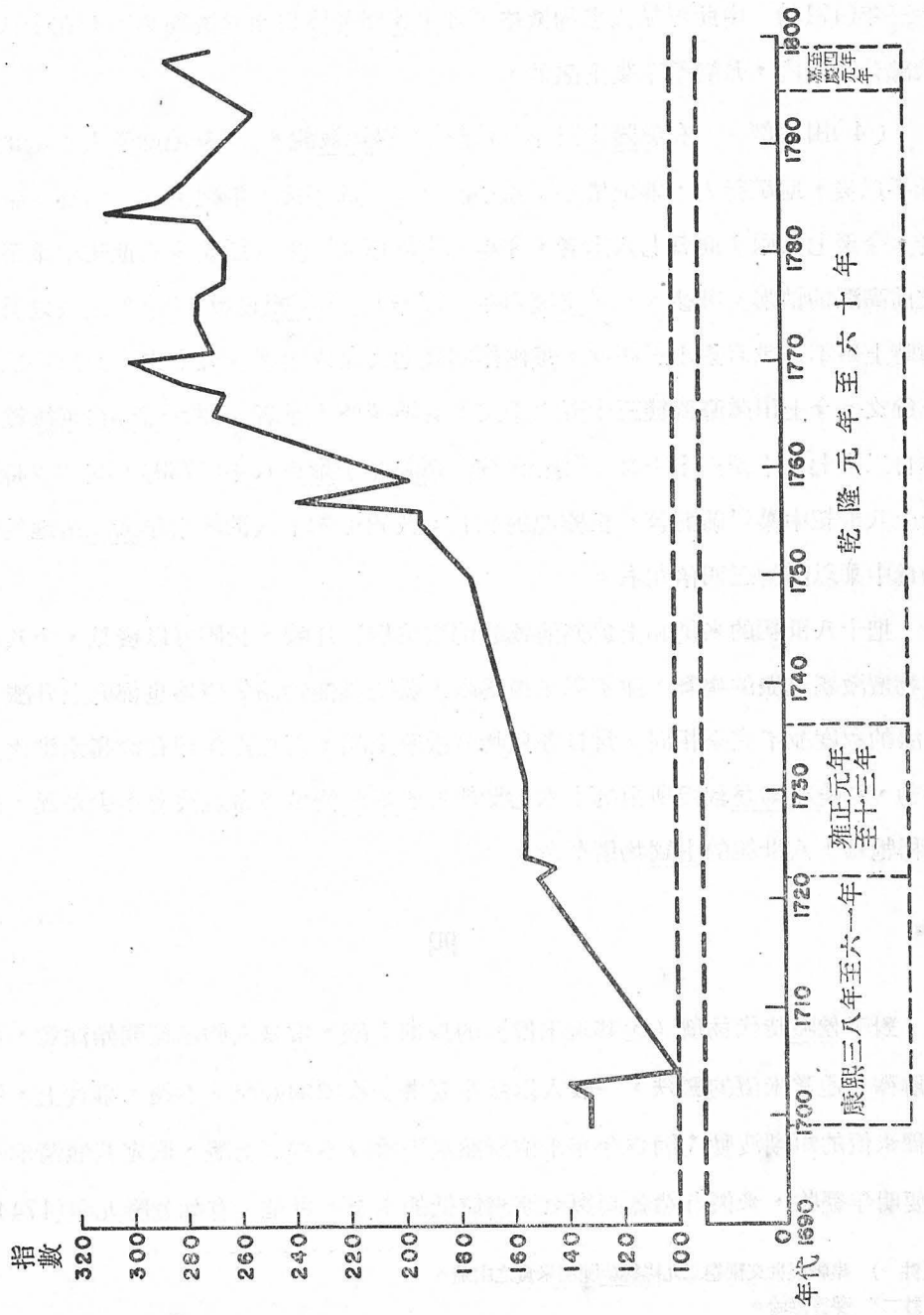
康熙四十一年(1702)	132	vol. I, p. 123	132
康熙四十二年(1703)	140	vol. I, pp. 121, 124	140
康熙四十三年(1704)	100	vol. I, p. 136	100
康熙六十一年(1722)	150	vol. I, p. 172	150
雍正元年(1723)	142-145	vol. I, pp. 176-177	144
雍正二年(1724)	155	vol. I, p. 180	155
雍正九年(1731)	155	vol. I, p. 203	155
乾隆十五年(1750)	175	vol. I, pp. 288, 291	175
乾隆二十年(1755)	190-195	vol. V, p. 24	193
乾隆二十一年(1756)	192.50	vol. V, p. 47	193
乾隆二十二年(1757)	225-250	vol. V, p. 60	238
乾隆二十四年(1759)	198	vol. V, p. 69	198
乾隆二十八年(1763)	240-250	vol. V, p. 108	245
乾隆三十年(1765)	269	vol. V, p. 124	269
乾隆三十二年(1767)	265	vol. V, p. 130	265
乾隆三十三年(1768)	265-294	vol. V, p. 137	280
乾隆三十五年(1770)	300	vol. V, p. 150	300
乾隆三十六年(1771)	265-275	vol. V, p. 160	270
乾隆三十八年(1773)	272.50	vol. V, p. 178	273
乾隆三十九年(1774)	272.50-277.50	vol. V, pp. 188-189	275
乾隆四十一年(1776)	275	vol. II, p. 8	275
乾隆四十二年(1777)	265	vol. II, p. 28	265
乾隆四十五年(1780)	265	vol. II, p. 53	265
乾隆四十八年(1783)	275	vol. II, p. 90	275
乾隆四十九年(1784)	310	vol. II, p. 96	310
乾隆五十年(1785)	290	vol. II, p. 110	290
乾隆五十二年(1787)	280	vol. II, p. 138	280
乾隆五十八年(1793)	255	vol. II, p. 198	255
嘉慶三年(1798)	288	vol. II, p. 315	288
嘉慶四年(1799)	270	vol. II, p. 324	270

資料來源：H. B. Morse, 前引書，vols. I, II (1926), V (1929).

（2）木棉花價及布價　除絲以外，木棉花（卽草棉，或原棉）也是紡織工業的重要原料。關于木棉花的價格，汪輝祖在病榻夢痕錄卷下記載乾隆五十七年(1792)浙江蕭山一帶，"木棉花一斤，制錢八十餘文。嚮不過三四十文一斤。自（乾隆）五十六年歉收，價至百文。時已少殺，不知何日得復舊也！"木棉花的價格既然高漲，用牠作原料來織成的棉布自然也要跟着漲價，故上引洪亮吉卷施閣文甲集卷一生計篇說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布價要比五十年前高漲好幾倍。

（3）人參價　汪輝祖夢痕錄餘在嘉慶三年（1798）項下記載，"讀查初白愼行敬

業堂集，有謝揆副憲惠人參一斤詩云：'十金易一兩， 又苦雜贋眞。 投之湯劑中，日飲僅數分。'味其言，若甚慍然。 今則參每株重一錢餘者，十金不能易二分矣。其重二三分者，亦非二十七八金不能得一錢，況一兩耶？且有高麗、昌平、東洋諸產，以



第四圖　清中葉以前廣州絲價指數（基期～1704年）

僞亂之。往歲己卯（乾隆二十四年，1759），徐頤亭爲余治病，前婦摒擋衣飾，質錢十千，易參一株，重一錢一分。不過四十年，價昂若此。使初白翁在，不知當作何語！”按查慎行詩原文見于他的敬業堂詩集卷四三副相揆公惠寄人參一斤賦贈，作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由此可見人參的價格，自康熙經乾隆以至嘉慶初葉，卽在十八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內，是繼續不斷上漲的。

（4）田地價　在乾隆十三年（1748），楊錫紱說，“國初地餘于人，則地價賤。承平以後，地足養人，則地價平。承平既久，人餘于地，則地價貴。向日每畝一二兩者，今至七八兩；向日七八兩者，今至二十餘兩。”(註一) 這是十八世紀中葉田地價格較前高漲的情形。其後，到了嘉慶四年（1799），汪輝祖也說，“余少聞故老言，……爾時上田不過畝直銀十三四兩，每兩作制錢七百文或七百四五十文，計田一畝止錢十千餘文。今上田畝直制錢三十五六千文，有增至四十千者。(浙江蕭山)東鄉較賤，然亦自二十七八千至三十千文。”(註二) 按汪輝祖生于雍正八年(1730)，其“少時”當卽指十八世紀中葉以前而言。根據他的記載，我們可知十八世紀末年浙江田地的價格，約爲中葉以前的三四倍左右。

把十八世紀的米價和上述其他物品的價格作一比較，我們可以發見，十八世紀下半物價激劇上漲的趨勢，並不以米價爲限，就是其他物品的價格也都向上升漲，雖然上漲的程度並不完全相同。當日各種物價激劇上漲，而長期停留在較高水準之上的大變動，和哈密爾登教授所稱的十六七世紀的西班牙物價革命並沒有多少差異，故作者試稱牠爲十八世紀的中國物價革命。

四

對于乾隆時代物價（尤其是米價）的長期上漲，當日人們已經開始注意，並試加以解釋。通常米價的漲跌，一般人以爲主要由于收成的好壞。不過，事實上，這只能解釋米價的短期波動；因爲今年米價雖然要因收成不好而上漲，假定其他情形不變，只要明年豐收，米價自然會回復至原來較低的水準。可是，有如乾隆九年(1744)二月

（註一）皇朝經世文編卷三九楊錫紱陳明米貴之由疏。
（註二）夢痕錄餘。

癸酉的上諭所說，"米價之貴，原非一歲驟長，自不能一歲驟平，"(註一) 可見當日米價的波動是長期的。這種長期的米價波動，絕不能拿某地或某年的歉收來加以解釋。關于此點，乾隆帝已經注意到，例如他于乾隆八年 (1743) 四月己亥說，"朕臨極以來，重農貴粟，……直省地方宜乎糗粱充裕，價值平減，閭閻無艱食之虞矣。乃體察各處情形，米價非惟不減，且日漸昂貴，不獨歉收之省爲然，即年穀順成，並素稱產米之地，亦無不倍增于前。……若以爲年歲不登，則康熙、雍正間何嘗無歉收之歲？"(註二) 其後，到了乾隆五十一年(1786)，他更注意到各省米糧收成良好，可是價格還要上漲的現象。例如是年六月甲戌上諭，"據閔鶚元奏到江蘇省四月分糧價清單內開，蘇、常兩屬米、麥價，……俱比上月加增等語。……本年蘇、常等屬，前據該撫等奏報春雨霑渥，麥收約計十分。當此民食充裕之時，一切米、麥等項市價自當漸就減落；即或未能頓減，應亦不過照前，斷無轉比上月加增之理。……似此有增無減，伊于胡底！"(註三) 又同年八月己酉上諭，"本日據何裕城奏到七月分糧價單，(江西)各府屬縣分開註價貴者居多。本年江西省收成尙屬豐稔，即鄰近各省，亦俱雨水調勻，並未有前赴該省糴運糧米之事，何以各屬米、麥、豆價轉昂？"(註四) 又同年十一月丁丑上諭，"適閱所開九月分糧價單內，(奉天) 米、穀、豆、麥等項，俱較上月昂貴。該處上年及本年收成俱屬豐稔，況九月正屬收成之候，新糧入市，何以價值轉增？"(註五)

米糧收成的豐歉，既然只能解釋米價的短期波動，而不足以說明乾隆年間米價長期上漲的趨勢，當日人們便另外拿人口增加的理由來加以解釋。根據官方的記載，中國人口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只有二三、三一二、二〇〇口，及乾隆五十七年(1792)激增至三〇七、四六七、二七九口；換句話說，在十八世紀的八十二年內，中國人口增加十三倍有多。(註六) 這種人口增加的速度，當然過于誇大。因爲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前，政府向人民課徵丁稅，人民因要逃稅而瞞報口數，故康熙四十九年官方

(註一) 乾隆東華續錄卷一九。
(註二) 同書卷一七。
(註三)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二五六。
(註四) 同書卷一二六二。
(註五) 同書卷一二六八。
(註六) 乾隆東華續錄卷一一八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戊午上諭；清史稿食貨志一；會正樊榭山房集卷一二。

統計的人口數字，不過是當日繳納丁稅的人數，顯然比實際人口數字要少得多。到了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帝規定此後丁稅以康熙五十年丁冊定爲常額，新增人丁稱爲“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隨着丁稅負擔的減免，人口隱匿不報的流弊纔漸漸糾正過來，從而官方統計的人口數字纔漸漸比較可靠。(註一) 因此，在乾隆末葉中國人口已超過三萬萬之說，是比較接近事實的。撇開康熙年間的人口數字不說，我們可以拿清代以前的人口來和乾隆五十七年的人口作一比較。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的數字在北宋大觀四年 (1110) 達到最高峯。根據宋史地理志的記載，是年全國戶數爲二〇、八八二、二五八戶；如以每戶平均五口的比率來推算，是年全國人口應爲一〇四、四一一、二九〇口。(註二) 由此我們可以推知，中國在十八世紀末葉的人口，雖然並沒有在短短的八十二年中增加十三倍有多，至少要爲清代以前人口最多時的三倍左右。因此，乾隆時代人口激增之說，仍然是一件事實。

關于人口增加與米價高漲的關係，在乾隆年間有不少人提出來討論。約在乾隆十三年 (1748) 左右，朱倫瀚說，“夫米穀之產于各處也，雖其地土之肥瘠，收穫之多寡不等，而一年所入只有此數。……何況盛世滋生，人口日衆，歲時豐歉，各處難一。以有限有則之田土，供日增日廣之民食，此所以不能更有多餘。以無多餘之所出，而欲供各處盡力之搬運，此所以米穀日見其不足，價值日見其增長。……臣少年隨任江西，往來外省各處。及補授浙江糧道十餘年，督率糧艘，前赴江、淮。又署任湖廣驛鹽道。合此數省觀之，其米穀之價，俱加倍于從前矣。”(註三) 又楊錫紱說，“臣伏查水旱偏災，與囤戶居奇，雖亦足致米穀之貴，然尙非所由貴之源也。臣竊以米穀之貴，由于買食者多。……戶口繁滋，則聖諭謂自康熙年間以來，休養生息，便應逐漸加增，何至一時頓長？以臣觀之，實亦未嘗不係漸增。臣生長鄉村，世勤耕作，見康熙年間稻穀登場之時，每石不過二三錢。……今則必需五六錢，……蓋戶口多則需穀亦多，雖數十年荒土未嘗不加墾闢，然至今日而無可墾之荒地者多矣。則戶口繁滋，足

(註一) 參考羅爾綱太平天國革命前的人口壓迫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民國三十八年一月) 第八卷第一期。

(註二) 這當然不是一個絕對精確的人口數字，但鑒于中國過去“五口之家”的事實，我們以五乘戶數來推算當日全國人數，應當是比較接近實際數字的。參考加藤繁支那經濟史概說，東京，昭和十九年，頁一四至一五。

(註三)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九朱倫瀚截留漕糧以充積貯劄子。

以致米穀之價逐漸加增，勢必然也。”(註一) 又乾隆東華續錄卷三三載乾隆十六年(1751)“閏五月戊辰，大學士等議覆：……卽如人生日用，最急者莫如食米一項。今謂意在恤民，而欲官爲立制，務使市價損之又損，閭閻皆得賤食。意則美矣，欲其行之于事，能乎不能乎？國家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戶口繁衍，自古希逢之盛會。人庶則用廣，用廣則價昂，此一定之理。……”又同書卷五〇載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丁酉上諭，“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民生不見兵革，休養滋息，于古罕有倫比。而天地生財止有此數，生齒漸繁，則食貨漸貴。比歲民數穀數，奏牘瞭然。”又同書卷七六載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月癸未上諭，“米糧價值贏縮，固視乎歲收豐歉。及閱歲既久，生齒日繁，則用物廣而需值日增，乃係一定之理。卽各省買補倉糧，屢請增價，可知矣。”又同書卷七八載乾隆三十八年(1774)十二月戊子上諭，“見今海寓戶口繁滋，難以數計。如各省糧價有增無減，卽可爲滋生繁庶之徵。”又同書卷一〇五載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甲申上諭，“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百物價值勢不能不較前增貴。卽如從前一人之食，今且將二十人食之；其土地所產，仍不能有加。是以市集價值，不能不隨時增長。”綜括這些議論，我們可知乾隆時代人口激增對于米價昂貴的影響，是當日一般人士公認的事實。

從理論上說，人口增加對于米糧價格長期上漲的影響，當然有密切的關係。人口多了，對糧食的需要增大。爲着要滿足這種需要，除原來比較肥美的耕地以外，農業須利用報酬激劇遞減的磽瘠土地來生產，以增加糧食的供應。(註二) 這樣一來，農業生產成本便要增高，從而米糧等農產品的價格便要激劇上漲。(註三) 根據這種說法，我們可知乾隆年間朝野人士對于人口激增與米價長期高漲關係的認識，是很有道理的。

可是，我們在這裏要注意，人口增加要促使物價長期波動的說法，只能應用于最易受報酬遞減定律支配的米糧等農產品的價格，如果應用于並不怎樣受同一定律支配

(註一) 同上楊錫紱陳明米貴之由疏。

(註二) 例如上引楊錫紱疏說，“數十年荒土未嘗不加墾闢。”這些在過去不從事耕種的荒土，從經濟學的觀點來說，當然是報酬遞減的土地。

(註三) 參考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史教授浦士坦(M. Postan)在第九屆國際史學會(IX° Congrès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宣讀的論文 (引自 J. Blum, “Prices in Russi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June 1956, vol. XVI, No. 2).

的其他商品(例如許多工業品或非農產品)的價格，是不很妥當的。(註一) 因此，對于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長期波動的解釋，除人口的增加以外，我們有再尋找其他因素的必要。

五

如上述，乾隆年間我國人士討論當日長期波動的物價問題，只從人口增加方面來加以解釋。可是，在乾隆五十八年 (1793)，隨同英國使臣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 來華的副使史當登 (Sir George Staunton)，因爲旁觀者清，却把當日中國物價長期高漲之貨幣的原因觀察出來，他說，"在過去一世紀 (卽指 1793 年以前的一百年) 內自歐洲流入中國的白銀，曾使各項消費品價格激劇上漲，而且改變了政府中一些官吏的固定薪金收入和他們的經常開支的比例。從前傳教士在他們的報告中曾說那時中國的生活費用非常低廉，可是現在那裏許多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並不比英倫低廉多少。"(註二) 這些大量流入中國，因而促使中國物價高漲的白銀，雖然大部分直接來自歐洲，事實上間接來自美洲；因爲如上文所述，在新大陸發見以後的長期間內，自墨西哥、秘魯及玻璃維亞銀礦中開採出來的白銀，曾經長期大量流入歐洲，使歐洲白銀的供給激劇增加。

美洲白銀之直接或間接流入中國，並不始于十八世紀，在明朝中葉以後，或在十六七世紀間，卽已開始。關于這個問題，友人梁方仲先生曾于抗戰時期撰有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註三) 一文，內說，"歐人東航以後，銀錢及銀貨大量地由歐洲人自南、北美洲運至南洋，又轉運來中國。關于這方面的數字，雖然亦缺乏不堪，但根據前面所說，由萬曆元年至崇禎十七年 (1573–1644) 的七十二年間，合計各國輸入中國的銀元，由于貿易關係的，至少遠超過一萬萬元以上。……由此我們亦可以知道一條鞭法得以用銀普遍的繳納的緣故。"

明亡以後，便是清朝。在清初的四十年內，由于東南沿海在軍事上的特殊形勢，

(註一) 同上。

(註二) Sir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1797, vol. II, p. 496.

(註三) 發表于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六卷第二期。

中國的海外貿易大受限制。這時鄭成功以臺灣爲根據地來和滿清對抗，在東南海上非常活躍，自山東以南至廣東，沿海都有“國姓”的商船往來。滿清的兵威，在大陸上雖然能够戰勝敵人，但對于海上的鄭氏，在積極方面却無攻打的能力，故只好在消極方面採取堅壁清野的政策。例如在順治十八年(1661)，開始實行大規模的海禁，自山東至廣東沿海的居民，連沿海各島的居民包括在內，都要向內地遷徙。(註一) 在這種情形之下，海外貿易自然要長期停頓，從而國家經濟自然要因白銀不能大量流入而大受影響。關于此點，我們可以舉出在海禁實施二十年後慕天顏所撰的請開海禁疏來作證明。他在該文中說，“自遷海既嚴，而片帆不許出洋矣。生銀之……途並絕，則今直省之所流轉者，止有現在之銀兩。凡官司所支計，商賈所貿市，人民所恃以變通，總不出此。而且消耗者去其一，堙沒者去其一，埋藏製造者又去其一。銀日用而日虧，別無補益之路。用既虧而愈急，終無生息之期。如是求財之裕，求用之舒，何異塞水之源，而望其流之溢也。豈惟舒裕爲難，而匱詘之憂，日甚一日，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由今天下之勢，卽使歲歲順成，在在豐稔，猶苦于穀賤傷農，點金無術。……于此思窮變通久之道，不必求之天降地出，惟一破目前之成例，曰開海禁而已矣。蓋礦礫之開，事繁而難成，工費而不可必，所取有限，所傷必多，其事未可驟論也。惟番舶之往來，以吾歲出之貨，而易其歲入之財。歲有所出，則于我毫無所損，而殖產交易，愈足以鼓藝業之勤。歲有所入，則在我日見其贏，而貨賄會通，立可以祛貧寡之患。銀兩既以充溢，課餉賴爲轉輸，數年之間，富强可以坐致。……猶記順治六七年間，彼時禁令未設，見市井貿易，咸有外國貨物，民間行使，多以外國銀錢，因而各省流行，所在多有。自一禁海之後，而此等銀錢絕跡不見一文。卽此而言，是塞財源之明驗也。可知未禁之日，歲進若干之銀，既禁之後，歲減若干之利。揆此二十年來所坐棄之金錢，不可以億萬計，眞重可惜也！”(註二) 由此可知，在順治十八年(1661)開始海禁以後的二十年內，由于海外貿易停頓，國外白銀不能流入，在國內曾經發生經濟蕭條及物價低落等現象，對于國計民生至爲不利，故慕天顏要請開海禁。

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滿清政府平定臺灣，翌年開海禁，中國的對外貿易遂

(註一) 參考張德昌清代鴉片戰爭前之中西沿海通商，清華學報（國立清華大學，民國廿四年一月）第十卷第一期。

(註二) 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六慕天顏請開海禁疏（約康熙二十年）。

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中國與西方的貿易，自十五六世紀開始，主要由葡萄牙及西班牙的商人操縱把持。及十六世紀末葉，荷蘭商人打破了葡萄牙人在東方獨佔的局面，而開始在東方貿易中佔居重要的地位。約在同一期間，英國商人組織成東印度公司，也逐漸在東方奠定基礎，其後到了十七世紀下半更進而奪取荷蘭商人的專利的地位。故在十八世紀前後中國與西方的貿易中，英國商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其他歐洲國家的商人都趕不上他們。至于中國對外貿易的港口，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以前，除廣州以外，厦門、寧波等港口也開放貿易，自乾隆二十四年起，則集中于廣州。(註一)

十八世紀中國的對外輸出，以茶、絲爲主，其國際市場擴展得非常之快。英國商人從事茶的貿易，始于十七世紀下半，但茶被運到英國以後，英國人很快便養成喝茶的風氣，無論在咖啡店或在家庭中都普遍喝起茶來。結果，中國茶的輸出大增。東印度公司由中國運茶至英，在一七一一至一七一七年不過一、三七六、一七一磅，及一七四八至一七五七年却增加至二九、二四一、五八五磅。(註二) 到了十九世紀的最初十年內，每年華茶在英平均賣出二千四百萬磅，其中多時一年賣出二千七百萬磅，少時也有二千二百萬磅。(註三) 除茶以外，絲也是很重要的出口商品。絲分兩項，一爲原料的絲觔(卽絲斤，或生絲)，二爲絲織品，在歐洲的銷路也很好。上引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奏摺曾說，"外洋各國夷船到粵，販運出口貨物，均以絲貨爲重，每年販買湖絲並紬緞等貨自二十萬餘斤至三十二三萬斤不等。統計所買絲貨，一歲之中，價值七八十萬兩，或百餘萬兩。……" 這許多茶、絲的出口，大都由歐洲商人經營，而以歐洲爲主要市場。此外，在由中國商人經營的海外貿易中，船也是出口商品之一，主要運銷于南洋一帶。例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上諭，"蘇州船廠每年造船多至千餘，出洋貿易，其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其餘皆賣在海外，賣銀而歸。海船桅木龍骨，皆中國所產，海外無此大木，故商人射利偷賣。"(註四)

(註一) 張德昌前引文。

(註二) Bal Krishna,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England (1601 to 1757), London, 1924, p. 195.

(註三) C. N. Parkinson, Trade in the Eastern Seas, 1793-181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7, p. 96.

(註四) 明清史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丁編第八本康熙五十六年兵部禁止南洋原案。

可是，當中國的茶、絲等出口貿易日益擴展的時候，歐洲商人輸入中國的商品，却不易打開銷路。自歐洲運來中國的貨物，以鉛的銷路爲最好。至于製造品，除少量的技術品如時錶及千里鏡以外，以毛呢織品爲重要貨物。可是，當日的中國人士還沒有養成穿西服的風氣，故毛呢的銷路非常之壞。(註一) 歐洲商人運來中國的貨物，其價值既然遠不如自中國出口的貨物那麼大，(註二) 故每年來華貿易的各國船隻，都要輸入大量白銀來支付貨價。例如一七〇二年東印度公司派兩艘船來厦門貿易，輸入毛呢、鉛及其他貨物共值銀七三、六五七兩，另外輸入白銀一五〇、〇〇〇兩，故輸入貨與銀的比例爲貨一銀二。(註三)又如一七三〇年東印度公司派五艘船赴廣州貿易，運入銀五八二、一一二兩，貨物則只值一三、七一二兩，故輸入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白銀。(註四) 在十八世紀的中國對外貿易中，有好些年中國出口值的三分之二以上都由外商以銀元及銀條來支付。(註五)

關于十八世紀中國因貿易出超而自國外輸入白銀的數量，清朝文獻通考（修于乾隆末年）的作者在卷一六乾隆十年 (1745) 項下說，"福建、廣東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錢。……閩、粵之人稱爲番銀，或稱爲花邊銀。凡荷蘭、佛郎機諸國商船所載，每以數千萬圓計。……而諸番向化，市舶流通，內地之民咸資其利，則實緣我朝海疆清晏所致云。" 因爲像這裏所引用的中國方面的記載，只是很含混的說外國商船載銀來華，"每以數千萬圓計，"並沒有確實的數字，故我們現在有利用外國方面的記載或研究來加以補充的必要。

在十八世紀和中國貿易的西方國家中，英國最爲重要。英國東印度公司于一七〇八至一七五七年輸往中國的白銀將達六百五十萬鎊。現在以十年爲一期，列表如下。

(註一) 張德昌前引文。

(註二) 例如東印度公司十六艘船于一七九二年自英國輸入廣州的貨物價值，將達一百萬鎊；于一七九四年自中國運英的貨物價值，却在一百五十萬鎊以上。其他歐洲國家輸入廣州的貨物價值約二十萬鎊，她們自廣州的輸出值則達六十萬鎊以上。參考 Sir George Staunton, 前引書, vol. II, p. 616. 按每鎊于一六一九至一八一四年間在廣州等于銀三兩，或銀元四元。事實上，東印度公司在廣州支付薪水及其他用費時，每一百鎊等于銀元四一六·六七元。參考 H. B. Morse, 前引書, vol. I, XXii.

(註三) H. B. Morse, 前引書, vol. I, p. 123.

(註四) 同上, p. 200.

(註五) S. R. Wagel, Finance in China, Shanghai, 1914, p. 97.

第九表　一七〇八至一七五七年英國白銀輸入中國數量(鎊)

年代	數量	年代	數量
1708-17	623,208.64	1738-47	731,966.62
1718-27	991,070.21	1748-57	2,684,702.30
1728-37	1,454,379.58	總共	6,485,327.35

資料來源：Bal Krishna, 前引書, pp. 208-209. (註一)

十八世紀中葉以後，隨着中國出口的激增，英國東印度公司運銀往中國的數量更要加多。在由一七七六至一七九一的十五年中，光是把有銀數記載的七年的數量加在一起，便達三百六十七萬鎊以上。

第十表　一七七六至一七九一年英國白銀輸入中國數量(鎊)

年代	數量	年代	數量
1776	88,574	1788	469,408
1785	704,253	1789	714,233
1786	694,961	1791	377,685
1787	626,896	總共	3,676,010

資料來源：Sir George Staunton, 前引書, vol. II, p. 625.

根據以上兩表，我們可知十八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由于中國茶、絲等物品的大量出口，除運來貨物以外，每年還要輸入大量的白銀來彌補貿易差額。隨着貿易差額的增大，當日英國輸入的白銀，有越來越增加的趨勢。除英國以外，歐洲其他國家的商人派船來華購運茶、絲等物出口，也因貿易差額的彌補而大規模把銀運來中國。到了十八世紀末葉，除歐洲各國以外，美國在獨立後也開始派船來廣州貿易，直接自美洲運銀到那裏去。現在根據有關記載，考查出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各國(連英國包括在內)每年輸入廣州的銀數，作成第十一表。表中所用的單位，依照原來的記載，以箱 (chest) 來計算，每箱內載銀四千元。(註二)

(註一) 原書只列舉各年代英國東印度公司輸往整個東方的金、銀的數量，可是說明在一七〇八至一七一七年的輸出量中有百分之一六運往中國，此外一七一八至一七二七年有百分之一九，一七二八至一七三七年有百分之二九，一七三八至一七四七年有百分之一四，及一七四八至一七五七年有百分之三五，都運往中國。故我們可以根據這些比例，計算出輸入中國的銀數。又東印度公司原來記載輸出的，是 bullion, 含有金、銀的意義。可是，根據 C. N. Parkinson (前引書, p. 76) 的研究，東印度公司使用這一個字，指的是銀，如果用于對華輸出的記載，尤其只能解釋作銀。

(註二) H. B. Morse, 前引書, vol. II, 135.

第十一表　一七七一至一七八九各國輸入廣州銀數(箱)

年代	國別	數量	見于 H. B. Morse 書的卷數及頁數
1771	英、荷、法、丹麥、瑞典	260	vol. V, p. 155
1772	同上	536	vol. V, p. 170
1774	同上	324	vol. V, p. 191
1776	同上	597	vol. II, p. 12
1777	同上	366	vol. II, p. 29
1778	同上	352	vol. II, p. 35
1779	英、荷、丹、瑞、奧	387	vol. II, p. 40
1780	同上	168	vol. II, p. 50
1781	英、丹、瑞	147	vol. II, p. 61
1782	丹、瑞	250	vol. II, p. 74
1783	英、法、丹、瑞、奧、西班牙、普魯士	680	vol. II, p. 84
1786	英、荷、丹	912	vol. II, p. 119
1787	英、荷、法、丹、瑞、普	1,378	vol. II, p. 136
1788	英、荷、瑞、美	998	vol. II, p. 152
1789		459	vol. II, p. 172
總共		7,814	

資料來源：H. B. Morse, 前引書, vols. II, V.

根據第十一表，我們可知，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光是就有紀錄可查的十五年來說，西方各國輸入廣州銀數已達七、八一四箱，或銀三一、二五六、〇〇〇元。換句話說，在這十五年中，各國每年平均輸入廣州的銀元在二百萬元以上。這不過是就各國商船抵達廣州時正式申報的數目說的；如果把未申報的數目都計算在一起，數字當然更要大得多。當日各國輸入廣州銀數較多的年份，除表中的數字以外，如果把未申報的數目加在一起，一七八六年廣州共約輸入銀元四百萬元以上，一七八七年共輸入五百五十萬元以上，一七八八年約輸入四百五十萬元。(註一)

歸納了上述各國每年輸入廣州的銀數，再加上其他有關的資料，摩爾斯 (H. B. Morse)曾經估計，在由一七〇〇至一八三〇年的一百三十年中，光是廣州一個港口，淨輸入白銀約在九千萬鎊至一萬萬鎊左右。(註二)如果每鎊作四元或四元多點計算，廣

(註一) H. B. Morse, 前引書, vol. II, pp. 119, 136, 152.

(註二)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Shanghai, etc., 1910, vol. I, p. 202.

州在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期的一百三十年中，約共輸入銀四萬萬元左右。根據上述美洲白銀大量流入歐洲的記載，我們可以說，這些輸入廣州的銀，大部分都產于美洲，不過先在歐洲各地流通，然後輾轉東來而已。

自十五六世紀間，哥倫布發見新大陸，麥哲倫(他本人在菲列濱被殺)繞航世界一週以後，墨西哥和菲列濱曾經長期成爲西班牙帝國的一部分，故在十七八世紀前後，有不少白銀直接自墨西哥運往菲列濱，再轉運來中國。(註一)依照德科民 (De Comyn) 的估計，由一五七一(明隆慶五年)至一八二一年(清道光元年)，自墨西哥運往馬尼剌 (Manila) 的銀約四萬萬元，其中約有四分之一(一萬萬元)流入中國。(註二) 至于中國對外貿易的港口，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以後固然以廣州爲限，在此以前厦門等港口也有外國商船前來貿易，從而把白銀輸入。例如“乾隆三年(1738)，六年(1741)，及十二年(1747)，呂宋之船來厦(門)貿易，曾有三次。”其後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呂宋商船又來厦門，“所帶米糧貨物之外，尙有番銀一十五萬圓，欲在內地置買綢緞等物。”(註三) 如果除經由歐洲輾轉運來以外，再加上直接經太平洋運來的美洲白銀，除輸入廣州以外，再加上輸入其他港口的白銀，那末，在由一七〇〇至一八三〇年的一百三十年中，中國約共輸入銀五萬萬元左右。(註四)

銀是當日中國的主要貨幣，故銀的長期大量輸入，要影響到中國貨幣流通量的激劇增加。隨着貨幣流通量的激增，根據費休 (Irving Fisher) 的貨幣數量學說，(註五) 物價水準自然要較前高漲。

不特如此，由于當日中國貨幣使用的特殊情況，十八世紀外國白銀大量流入的結果，中國貨幣流通的數量和速度都較前特別增加，故物價更特別高漲。當日自外國輸

(註一) 例如梁廷枏粵海關志卷二四米時哥國條說，“米時哥 (Mexico) 亦呂宋屬國，其地多鑄花邊錢，無物產。海舶至粵者，惟載銀錢而已。”

(註二) J. B. Eames, The English in China, p. 63. 原書未見，茲引自小竹文夫關于清代銀、錢比價的變動，支那研究 (上海，昭和五年五月) 第二十二號。

(註三) 史料旬刊第一二期籲香撫 (乾隆二十年)。又同書第一八期李有用摺(乾隆二十年)也說，“茲又據報，有夾板夷商到口，均係呂宋之船。……船中舵水貨客共一百三十九人，載來食米、貨物、銀兩，實係來厦貿易，並無他故。當即准其入口。……該番船載來……番銀十餘萬兩，……現在交商貿易。”

(註四) H. B. Morse, China and the Ear East (Clark University's Lecture). 原文未見，茲引自小竹文夫前引文。

(註五) Irving Fisher,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New York, 1911.

入的白銀，除紋銀 (Sycee) 外，以銀元（一作圓）爲主。銀元又名叫洋錢，番銀，或洋銀，都是在各國造幣廠中鑄成的銀幣。當日自西方各國輸入的銀元，由于國別不同，種類甚多，其中尤以西班牙銀元爲最重要。因爲中國貨幣以銀兩爲單位，這些外國銀元在中國市場上被用來償付貨價時，都要按照成色及重量折算成銀兩來支付。當外國銀元源源不斷的流入中國的時候，中國在貨幣方面正在實行銀兩與制錢並用的制度，即兩者都是無限法貨，不過因爲本身價值的大小各有不同，故買賣大的多半用銀，小的多半用錢來作交易媒介。可是，當日的銀兩，(1)形式不統一，(2)名稱太複雜，(3)成色有高下，(4)重量難計算，(註一) 故在市場上交易使用時，人們往往感到折算的煩難。至于制錢，一來因爲本身價值太小，既不便于遠路携帶，又不便于鉅額支付；二來因爲私鑄盛行，以致在各地市場上，除政府正式鑄造的制錢以外，還有各種私錢的流通，使用起來非常不便。這種不便的情況，在商業幼稚，交易稀少時，人們還可以忍受得住；可是，到了十八世紀下半的乾隆時代，當人口激增，商業發達，交易頻繁的時候，情況却要變爲越來越嚴重了。在這種情勢之下，外國銀元的大量流入，正好彌補這個缺憾，而適應當日客觀的經濟需要。當日輸入中國的外國銀元，形式比較統一，名稱比較簡單，同時成色與重量也比較一致，在交易時計算與授受都比較簡便，故大家都樂于使用。大家對銀元的需要既然增大，其成色雖然沒有像紋銀或庫銀那樣高，市價反而要在後者之上。例如汪輝祖在嘉慶元年(1796)記載浙江蕭山一帶，"每番銀一圓，直制錢一千七八九十文。市肆交易，竟有作錢一千一百三四十至七八十者，杭州尤甚。銀價因之日減。……錢既參錯，用者不便，乃計所易之錢折受番銀，故番銀之價昂于庫銀。……今錢法不能畫一，而使番銀之用廣于庫銀，……不知其流安極！"(註二) 又林則徐于道光十二至十六年 (1832–36) 任江蘇巡撫時，追述過去外國銀元流通的情形說，"從前洋錢流入內地，其成色比紋銀爲低，其價值原比紋銀爲賤。因小民計圖便利，日漸通行，未幾而洋銀等于紋銀，又未幾而洋價浮于銀價。"(註三) 他又說，"夫以色低平短之洋錢，而其價浮于足紋之上，誠爲輕重倒置。

(註一) 魏建猷清代外國銀圓之流入及其影響，東方雜誌（重慶，民國三十四年九月）第四十一卷第十八號。

(註二) 病榻夢痕錄卷下。據第一表引夢痕錄餘，嘉慶二年銀每兩不過換錢一千零二十至三十文；可是每枚重量不過七錢二分，而成色又不如紋銀的外國銀元，在嘉慶元年却換錢多到一千一百餘文。由此可見當日外國銀元因需要大而市價昂貴的情形。

(註三) 林則徐林文忠公政書甲集江蘇奏稿卷八漕費禁給洋錢摺。

……無如閭閻市肆久已通行，長落聽其自然，恬不爲怪。……臣等詢諸年老商民，僉謂百年以前，洋錢尚未盛行，則抑價可也，卽厲禁亦可也；自粵販愈通愈廣，民間用洋錢之處轉比用銀爲多，其勢斷難驟遏。蓋民情圖省便，尋常交易應用銀一兩者，易而用洋錢一枚，自覺節省，而且無須彈兌，又便取携。是以不脛而走，價雖浮而人樂用，此係實在情形。"(註一) 和紋銀比較起來，銀元的市價既然相對的高昂，故輸入同樣數量或重量的銀元，在市場上折算出的銀兩，要比同樣數量或重量的紋銀爲大。這樣一來，外國銀元的大量流入，自然更要影響到中國貨幣流通量(以銀兩表示)的特別增多了。何況這些銀元"價雖浮而人樂用，"其流通速度又因大家樂于互相授受而增大呢？中國貨幣流通的數量與速度，既然要因外國銀元的大量流入而特別增大，物價自然要向上升漲，而長期停留在較高水準之上了。

六

綜括上文，我們可知，自新大陸發見後，在那裏銀礦中生產出來的白銀，其對于物價的影響，是具有世界性的。這些白銀大量流入西班牙及其他歐洲國家的結果，固然要促使那裏的物價向上升漲；就是在老遠的中國，當美洲白銀直接經太平洋，或間接經歐洲輾轉流入以後，物價也同樣發生波動。不過因爲中國和美洲的距離較遠，故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在明朝中葉以後，或在十六七世紀間，雖然已經開始，大規模的流入中國，事實上比流入歐洲要晚得多；因此，中國的物價並不像歐洲那樣早在十六七世紀便已開始上漲，而遲至十八世紀纔發生激劇的變動。不特如此，十八世紀的中國，除如歐洲過去那樣受美洲白銀的影響以外，又要受人口增加的影響，故物價波動得特別利害，就米價來說，在整個十八世紀約上漲四倍有多。這和十六世紀西班牙物價上漲將近三倍半比較起來，可說有過之而無不及。假如十六七世紀西班牙的物價變動可以像哈密爾登教授那樣稱爲"物價革命"的話，十八世紀中國物價的大變動，當然更可以當之無愧了。

現在我們要問：當中國在十八世紀因對外貿易出超而大量輸入白銀，從而物價長期波動的時候，國計民生要受到什麼影響？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試從兩方面來加

(註一) 同書卷一會奏查議銀易錢賤除弊便民事宜摺。

以探討。在乾隆時代，當物價上漲的時候，凡是貨幣收入增加的速度能够趕得上物價的人，生活都可以過得去。例如汪輝祖記載乾隆五十九年（1794）浙江蕭山的情形時說，"夏間米一斗錢三百三四十文。往時米價至一百五六十文，卽有餓殍。今米常貴，而人尙樂生。蓋往時專貴在米，今則魚、蝦、蔬、果，無一不貴，故小販、村農俱可餬口。"(註一) 除小販、村農以外，做大買賣的商人，當物價波動的時候，更可以乘機大發其財，從而資金的累積便越來越大。例如就兩淮的鹽商來說，"向來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數十戶，蓄貲以七八千萬（兩）計。"(註二) 這些爲一百幾十家鹽商所擁有的七八千萬兩的資本，着實是一宗很大的財富。偌大的一個漢陽鐵廠，在光緒十六至二十二年(1890-96)的官辦時代，也不過投資五百多萬兩而已。(註三) 因爲民間蓄積了這樣大的財富，政府的稅收自然旺盛，故乾隆時代人民租稅的負擔雖然沒有加重，政府的開支雖然越來越大，戶部銀庫積貯的銀兩仍然激劇增加。例如乾隆東華續錄卷七六載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癸卯上諭，"方今國家當全盛之時，左藏所儲，日以充積。乾隆初年戶部銀庫止三千三四百萬，而今已多至七千八百餘萬，奚翅計倍而贏！"又同書卷九四載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丁卯上諭，"朕卽位初年，戶部銀庫計不過三千萬兩。今四十餘年以來，仰荷上蒼嘉佑，年穀順成，財賦充足，中間普免天下地丁錢糧三次，蠲免天下漕糧兩次。又各省偏災賑濟，及新疆、兩金川軍需所費，何啻萬萬！而賦稅並未加增，……見在戶部尙存銀七千餘萬兩。"又同書卷一〇四載乾隆五十一年（1786）閏七月庚寅上諭，"朕卽位初年，戶部銀庫計不過三千餘萬兩。……去年江南等處賑費亦至千餘萬。然見在戶部庫銀尙存七千餘萬，較之卽位初年，已多一倍有餘。"(註四)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當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長期波動的時候，人口又特別增加，以致有許多人因爲貨幣收入遠落在物價之後而生活水準降低。例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洪亮吉說，"四民之中，各有生計。……除農本計不議外，工商賈所入之至少者日可

（註一） 病榻夢痕錄卷下。

（註二） 汪喜孫從政錄（汪氏叢書）卷二姚司馬德政圖敍。

（註三） 拙著清末漢陽鐵廠，社會科學論叢（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民國三十九年四月）第一輯。

（註四） 又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二六一，清史稿食貨志二，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六阿桂論增兵籌餉疏（乾隆四十六年），許楣鈔幣論通論七，及王慶雲石渠餘紀卷五都有相似的記載。

餘百錢，士傭書授徒所入日亦可得百錢。是士、工、商一歲之所入，不下四十千。開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時，米之以升計者錢不過六七，布之以丈計者錢不過三四十。一人之身，歲得布五丈卽可無寒，歲得米四石卽可無饑。米四石爲錢二千八百；布五丈爲錢二百。是一人食力，卽可以養十人。卽不耕不織之家，有一人營力于外，而衣食固已寬然矣。今則不然。……昔之以升計者，錢又須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計者，錢又須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愈廣。于是士、農、工、賈各減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價以出市。此卽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註一) 又如汪輝祖說嘉慶四年 (1799)，"食用百物，俱比往歲更昂。余少聞故老言，中人之家，有田百畝，便可度日。……近年租入較絀，田百畝，……十餘口之戶，支給不易。況不能百畝者乎？"(註二) 當日這許多人因物價高漲而生活艱苦的情況，和清中葉以後各地大規模的暴亂有什麼關係，着實是值得我們研究的一個問題。

民國四十五年九月十四日，臺北市。

附記：文中各圖的繪製，曾蒙同事潘實君先生及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研究所研究生王業鍵君給予幫助，特此誌謝！

(註一) 卷施閣文甲集卷一生計篇。
(註二) 夢廬錄餘。